

凭窗读史

交往“断崖式”减少

陈师曾于1923年9月17日在南京去世。当年10月17日,陈师曾追悼会在北京宣武门外江西会馆举行,鲁迅没有参加。《鲁迅日记》载:“(1923年12月)十二日,……,陈师曾赶来,赠二元。”这里的“赴”指报告。“赠(fù)”即赠金,特指向丧家赠送的慰问金,属于人情往来的一种。

若说鲁迅在12月12日之前完全不知道陈师曾去世的消息,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因为10月17日举行的陈师曾追悼会堪称当时北京城一件大事,梁启超在《师曾先生追悼会上演说》中说道:“陈师曾在现在美术界,可称第一人。无论山水花草人物,皆能写出他人的人格。……师曾之死,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,甚于日本之大震。”(日本于1923年9月1日发生7.9级的关东大地震,造成约10万人伤亡)参加追悼会的北京文艺界著名人士多达300余人,其中不乏教育部同僚,以及其他方面与鲁迅有交往者,何况当时报纸对此重大新闻也多有报道。

从《鲁迅日记》综合来看,鲁迅向人赠送赠金,最低一元,普遍为二元,也有少数赠送三到五元,个别甚至有十元的。曾任教育部次长(即副部长,系鲁迅上司)的董尚士1916年3月去世,《鲁迅日记》载:“(1916年3月)二十一日,……下午赠董尚士家十元。……”在陈师曾去世的同一年,“(1923年5月)十九日,……,同僚张君病故,赠五元。”“(1923年6月)二十七日,……,上午赠退卿五元。”相比之下,不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教育部同僚,陈师曾此时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都是比较“普通”的。

对于鲁迅没有参加陈师曾追悼会,目前学界一般的推测是,鲁迅当时刚与周作人决裂,可能无暇顾及。笔者认为此说难以成立,因为恰好有夏曾佑这个相反的例证。夏曾佑曾是鲁迅的顶头上司,鲁迅与夏曾佑也经历了交往由密转疏的过程。1924年5月1日,鲁迅收到夏曾佑的讣告,也是“赠二元”,但是与缺席陈师曾追悼会不同,5月8日鲁迅又亲赴灵堂,“下午往吊夏德卿先生丧”。

《鲁迅全集》里亦找不到一篇专门为陈师曾而写的纪念文章。在初版于1928年8月的《朝花夕拾》这部“回忆的记事”里,鲁迅写了十篇回忆往事、故人的文章,其中甚至为一同留学日本,但关系并不密切的范爱农写了一篇专文,却没有为陈师曾写一篇。不但《朝花夕拾》中没有,在陈师曾去世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,鲁迅写过不少人,却始终没有落笔写陈师曾。

几种原因猜想

鲁迅与陈师曾的交往为何由密转疏,目前鲁迅研究界比较主流的看法,认为是由于两人对于传统中国画的观点分歧所致。

五四运动前后,以康有为、陈独秀、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健将,发出了“美术革命”号召。对于美术,他们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——要求在中国社会革新与文化革新的框架下进行中国画革新,将“美育”当成移风易俗的社会工程。比如陈独秀认为

鲁迅与陈师曾之间的交往,一直被学界当成文人友谊的佳话传颂。他们俩早年就是同学,后来一起留学日本。回国后,又同在北京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。在北京共事这段时间里,两人来往十分密切。陈师曾去世后,鲁迅持续购藏陈师曾作品相关出版物。然而,令人困惑的是,从《鲁迅日记》可看出,1919年起,二人之间的交往急剧减少;1923年陈师曾去世,鲁迅的反应也比较平静。在他们交往的后半程到底发生了什么?笔者尝试综合相关文献,对此作一探讨。



陈师曾(1876年—1923年)。

“画家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”,“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用洋画写实的精神”,同时全面否定自王维、苏轼而下“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”。

针对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中国文人画不如西方写实绘画的观点,陈师曾先是发表了《文人画之价值》一文,指出文人画的价值所在。紧接着又发表了《中国画也是进步的》《中国人物画之变迁》等文章,站在历史的高度,对中国画的进步性作出更深层的阐释。陈师曾认为,“西洋画界以法国为中心,东洋画界以吾国为巨擘。欧亚识者,类有是言。东西画界遥相对峙,未可轩轻。系统殊异,取法不同。要其唤起美感,涵养高尚之精神则一也。”陈师曾对于美术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:“美术者,所以代表各国民之特性”,在这个大前提下,即便采纳西法,也不能以丧失本国绘画的特色为代价,所以“研究之法,宜以本国画为主体,舍我之短,采人之长。”

鲁迅与陈师曾交往的后半程



鲁迅收藏的陈师曾画作。

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,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,其中包括其美育理念的推广和落实。1917年12月1日,陈师曾应蔡元培之邀,赴北大作了名为《清代山水画之源流、派别》的讲演,反响十分热烈。蔡元培随即邀请陈师曾筹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,且委托陈师曾物色合适人选,担任画法研究会导师。陈师曾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尽心尽力将近一年,最终由于他与蔡元培在理念上的冲突加剧,遂于1918年10月辞去了画法研究会导师之职。

另一方面,鲁迅1919年在《新青年》的《随感录》发表多篇文章(四十三、四十六、五十三),讨论美术问题,“进步的美术家,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。……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,是能引路的先觉,不是‘公民团’的首领。”“我于美术虽然全是门外汉,但很望中国有新兴美术出现。”后来,在1935年2月4日致李桦的信中,鲁迅还表示:“我以为宋末以后,除了山水,实在没有什么绘画,山水画的发达也到了绝顶,后人无以胜之,……元人的水墨山水,或者可以说是国粹,但这是不必复兴,而且即使复兴起来,也不会发展的。”一些学者据此认为,鲁迅对于传统中国画的观点与陈独秀、蔡元培等思想健将一致,而这正是1919年以后鲁迅与陈师曾交往迅速降温的原因。这实际上是对鲁迅美术思想的曲解。检阅原文可知,上述《随感录》里的观点,是针对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增刊《泼克》上刊载的低级趣味图画而发的,不能脱离这个具体语境而将其随意泛化。至于鲁迅给李桦信中有关中国画的表述,其实在那段话之前还有这样几句:“我看先生的作品,总觉得《春郊小景集》和《罗浮集》最好,恐怕是为宋元以来的文人的山水画所涵养的结果罢。”很明显,鲁迅并

不否认传统中国画的价值,而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画作出不同的评价。

学者孙伟在《如何保存“国粹”——论鲁迅对文人画的摄取》一文中,根据《鲁迅日记》所记购买美术书籍统计,鲁迅对文人画的喜爱不仅贯穿北京和上海两个不同阶段,且涉及的画家也遍布各个历史时期。学者邓锋在其博士学位论文《“东西画界”:通变与自觉——陈师曾画学思想及艺术实践再研究》中提出,鲁迅对于文人画传统不仅有所关注,而且有明显的偏重:一是对高古的白描传统非常推崇,二是喜欢具有个性和创新的画家,以陈洪绶和石涛为最。而这两个审美取向均与陈师曾完全一致。鲁迅收藏有多幅陈师曾画作,在二人关系降温之后的1921年1月,鲁迅日记尚有“午后从陈师曾索得画一幅”的记录。陈师曾去世后,鲁迅持续购买陈师曾作品集《师曾遗墨》。这都说明鲁迅对陈师曾绘画理念的高度认可。

鲁迅夫人许广平在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》一文中写道:“所以先生时常说:‘我觉得先同我闹过,后来再认识的朋友,是一直好下去;而先是要好,一闹之后,是不大会再好起来的。’这几句话,拿来考察先生和朋友之际的关系,似颇的确。”

鲁迅与陈师曾“先是要好”,后来没有“再好起来”,是不是也因为“闹”过呢?目前尚无直接的证据。但是在鲁迅日记里,也记录了他与陈师曾之间似乎并不那么愉快的事件。比如1918年5月有这样两则:“十一日雨。晚以师曾函往朱氏买专拓片,并见泉二,复云拓片未整理,泉收也。”“十三日晴。上午师曾交朱氏所卖专拓片来,凡六十枚,云皆王树枏所藏,拓甚恶,无一可取者。……”

由密转疏非孤例

在鲁迅的人际交往中,像他与陈师曾这样,始于密切、终于疏远的情况绝非孤例,比如刘半农、钱玄同、孙伏园等等,可以说是不胜枚举。

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(1887年—1937年),1906年赴日本东京,入早稻田大学读师范专业,1908年与鲁迅等人在章太炎门下学习文字学。五四运动前后,钱玄同是《新青年》编者之一,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。这个时期鲁迅与他交往密切。鲁迅的代表作《狂人日记》就是在钱玄同的催促下,并经过钱玄同之手发表在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号上的。现存的《鲁迅日记》里,从1915年到1925年期间,有关钱玄同的记录多达140多次(最后一次为1925年7月21日,“夜得玄同信”)。

1925年7月这一个月里,钱玄同的名字还在《鲁迅日记》中出现了6次之多,从那以后,却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正

如钱玄同在鲁迅去世当月即1936年10月所写的《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》一文中所写,“十五年秋天,豫才(即鲁迅)到厦门去教书,从那时直到现在,这十年之中,与我绝无往来。”

1929年5月26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:“我今天的出门……途次往孔德学校,去看旧书,遇钱玄同,恶其噜苏,给碰了一个钉子,遂远远避去……”钱玄同在《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》一文中详细叙及此事,并表达了自己的困惑:

十八年(1929年)五月,他到北平来过一次,因幼渔的介绍,他于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问,孔德那时是孔德的校务主任,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。我也在孔德那边谈天,看见他的名片还是“周树人”三字,因笑问他,“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,不用两个字的。”我意谓其不用“鲁迅”也。他说,“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,没有两个字的,也没有四个字的”,他所谓四个字的,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!我那时喜欢古法,缀“号”于“名”上,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,说我改姓“疑古”,其实我也没有这四个字的名片。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,就不再与我谈话了,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,就走了出去。后来看见他的《两地书》中说到这事,把“钱玄同”改为“金立因”,说,“往孔德学校,去看旧书,遇金立因,胖滑有加,唠叨如故,时光可惜,默不与谈”。我想,“胖滑有加”似乎不能算做罪名,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。……

钱玄同在《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》一文中,也对鲁迅的长处作出了公允的评价:“他治学最为严谨”“他读史与观世,有极犀利的眼光,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”,同时表示:“但我认为他的短处也有三点,(一)多疑。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,以为是有意恶意的,甚至于是要陷害他的,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。(二)轻信。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,遂认为同志,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,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。(三)迁怒。譬如说,他本善甲而恶乙,但因甲与乙善,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。”

百年以后的今天,审视鲁迅的人际交往,应该说钱玄同关于鲁迅短处的上述观点也是比较客观的。反观鲁迅与陈师曾这对曾经的挚友,如果鲁迅与陈师曾之间确实是因为“闹过”而导致了疏远,则这个“闹”的起因较大可能也与鲁迅的上述性格特点有关。然而,即使鲁迅在与陈师曾关系疏远之后,他仍然对陈师曾的艺术作品赞赏有加——这一方面既折射出鲁迅性格的复杂性、独特人格魅力,同时也凸显出陈师曾艺术作品所具有的不可磨灭的非凡价值。

张德斌



文明贵阳
WEN MING GUI YANG



全国文明城市
National Best Community Award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讲文明 树新风

文明贵阳人 美丽贵阳城



黔灵山公园

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 贵阳市精神文明办 宣